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论坛系列

ZHONGGUO GUOJI GUANXI XUEHUI BOSHI LUNTAN XILIE

国际关系研究

探索与创新

2009年博士论坛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编
外交学院



世界知识出版社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Exploration & Innovation Ph.D. Candidates Forum 2009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和外交学院联合主办2009年博士论坛。论坛有三个目的。第一，搭建博士学术交流的平台。为了大家能够砥砺学问，激活思想，启迪智慧，进一步推动我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提高学术水平。第二，开拓校际师生交流的渠道。请来一些国内知名的学者和专家来做点评教师。希望点评和大家的发言讨论能够成为一种平等的交流，从这些交流中撞击出思想的火花，催生学术的灵感，在今后的学习研究中发扬光大。第三，启发国际关系学科的学理研究。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论坛从2006年起，每年举办一届，每届出版一部专集。本书是第四部。

ISBN 978-7-5012-3784-5



9 787501 237845 >

定价: 33.00元

国际关系研究：探索与创新

——2009 年博士论坛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编
外交学院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关系研究: 探索与创新: 2009年博士论坛 /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外交学院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012-3784-5

I. ①国… II. ①中… ②云… ③外… III. ①国际关系理论—2009—文集 IV. ①D8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34603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封面设计

袁路明
赵 玥
马莉娜
徐威明 小 月

书 名

国际关系研究: 探索与创新
——2009年博士论坛

Guoji Guanxi Yanjiu: Tansuo Yu Chuangxin——2009Nian Boshi Luntan

作 者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编
外交学院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网 址
印 刷
经 销
开本印张
字 数
版次印次
标准书号
定 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www.wap1934.com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
787 × 1092毫米 1/16 17¼印张
300千字
2010年3月第一版 2010年3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12-3784-5
33.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撰稿人（按专家匿名评审得分顺序排列）

- 赵广成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生
李巍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后
杨扬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董青岭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生
张永义 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博士生
陈小鼎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
胡欣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
朱天祥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专业博士生
吴乃兵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姜亚萍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李洁宇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生
胡文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赵冰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赵姝岚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世界史专业博士生

评论人（按姓氏笔画排列）

- 方长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教授
王正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磊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李少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李 滨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系教授

肖 宪 云南大学副校长，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博士生导师

周桂银 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秦亚青 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博士生导师

袁正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郭树勇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学科进步与平等的学术批评精神 秦亚青 / 4
——在第四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论坛上的致辞

云南大学领导致辞 肖宪 / 6

点评专家代表讲话 李少军 / 9

博士生代表讲话 张永义 / 11

国际体系的中产阶级化与没有收益的非对称冲突 / 1

从 IPE 到 GPE：一个交叉学科的成长史 / 19

国际关系的信任理论：一种社会学解读——兼析东亚区域
合作中的互信 / 40

在冲突与合作之间：作为元理论或理论桥的建构主义 / 54

融入与自主性的平衡：中国外交的核心问题 / 78

价值观外交与国际政治伦理冲突 / 100

探析结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的构建 / 112

康德国际政治观的精神解读——乐观主义、渐进变革和终
极关怀 / 129

地区间主义参与全球治理：霸权如何起作用 / 148

批判·综合·超越——安德鲁·林克莱特与国际批判理论创
新 / 162

对外经济援助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 179

论自尊心、恐惧感和国家间关系——以以德关系为例分析国
际政治中的理性和感情因素 / 196

论大国的国际责任——兼论中国的国际责任 / 216

美国出口管制政策解析 / 232

中国对赞比亚援助思考 / 247

后 记 / 261

国际体系的中产阶级化与 没有收益的非对称冲突

赵广成（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本文将体系外行为体与主导国际体系的关系视为一种“挤车博弈”模型，同时将社会学中的弱势群体理论移植到国际体系中，提出了一种“损失驱动的冲突解释模式”，用以解释当今世界上“以卵击石”的非对称冲突。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次“挤车博弈”高潮的结果，当今国际体系发生了集权化、制度化和合法化三大结构性变化，从而形成了“纺锤形”的国际体系结构，造就了处于失语状态的国际弱势群体。本文将这种趋势称为“国际体系的中产阶级化”。这种体系虽然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但国际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被封堵，使它们成为现有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净受损者，只能按照损失驱动模式与强者进行抗衡。它们的“以卵击石”行为虽然无法撼动整个国际体系，但却是世界和谐的重大隐患。

[关键词] 国际弱势群体 国际中产阶级 非对称冲突 损失驱动模式 挤车博弈模型

自从安德鲁·麦克（Andrew Mack）1975年发表“大国为何输掉小战争”一文^①以来，非对称冲突进入了学界的研究视野。通常所说的非对称冲突都表现在实力方面，挑起冲突者都是受预期收益的驱使，^②但有一种实力和收益都严重不对称的冲突，现有成果无法予以充分解释。朝鲜和古

^① Andrew Mack, "Why Big Nations Lose Small Wars: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ic Conflict", *World Politics*, 13 (January 1975), pp. 175-200.

^② T. V. Paul, *Asymmetric Conflicts: War Initiation by Weaker Powe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3, 33-35.

巴等国长期与美国对抗,巴勒斯坦人频频向以色列发动自杀式袭击,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以小团体之力与西方国家进行抗衡,诸多个人和非国家行为体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这些冲突有两个共同特点:(1)都是在双方实力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弱者向拥有绝对优势的强者发起挑战;(2)弱者发起的挑战显然没有取胜的可能,导致的冲突也不会为其带来任何直接收益。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弱者为何要向强者挑起无法取胜也没有收益的冲突?

本文旨在提出一个新的冲突解释模式,对此类违反常理的非对称冲突进行解释。下面首先对现有的冲突解释模式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损失驱动的冲突解释模式;然后从挤车博弈的视角探讨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机制,以及结构变化对于体系的稳定性与和谐程度的影响;接着以挤车博弈为框架考察当今国际体系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弱小国际行为体造成的体系性后果;最后将社会学的弱势群体理论移植到国际关系中,从国际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角度解释没有收益的非对称冲突。结论部分简要地总结本文的观点,并指出确保国际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是化解此类非对称冲突的根本途径。

一、两种不同的冲突解释模式

冲突是行为体的目标不相容引起的敌对性互动。现有的冲突和非对称冲突研究集中关注三大问题,分别是冲突爆发的原因、双方获胜的条件以及避免和管理冲突的途径。这些研究沿着两个相互关联的路径进行:(1)预期收益是行为体挑起冲突的直接原因,即“收益→冲突”因果链;(2)实力对冲突结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即“实力→胜利因果链”。^①本文称之为“实力和/或收益驱动的冲突解释模式”。这种模式虽然能对多数冲突给予合理的解释,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疏漏和盲区。

首先,现有的国际冲突研究主要关注国家之间的冲突,忽视了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现有文献集中研究战争爆发的原因,而忽视了一般意义上的冲

^① “实力→胜利因果链”引自毛维准、刘奉祯:“透视‘鼠象之争’:‘不对称冲突’理论探析”,载《国际问题论坛》2007年秋季号(总第48期),第142页。

突问题。事实上,战争只是冲突的一种极端形式。在全球化时代,战争的频率和烈度呈下降趋势,而非战争冲突有增无减。在此情况下,单纯研究战争的现实意义大大降低,我们有必要将非战争敌对行为纳入研究视野。

再次,学者们习惯于沿着“实力→胜利因果链”研究非对称冲突,将弱者赢得战争的原因归结为短期和局部优势。现实主义者以实力作为解释冲突的核心变量,得出了在非对称冲突中强者总是获胜的结论。^①但弱者发动的战争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以弱胜强的战争也并不鲜见。在1800—2003年间发生的200起非对称冲突中,弱者的获胜比率高达28.5%。^②在1945—2007年间的36场非对称冲突中,弱者获胜的案例更是攀升到了58.3%。^③然而,学者们都从实力角度界定非对称冲突,并以此寻找弱者发动非对称战争和以弱胜强的原因。^④他们的研究在寻找“实力→胜利因果链”的盲点,^⑤但仍然是沿着这一因果链进行的。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非对称冲突学者都没有逃脱“成本/收益”解释模式,继续沿着“预期收益→发动战争”的因果链解释弱者发动战争的原因。^⑥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强烈抨击关于战争原因的研究“多而无用”,提出了五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战争原因假设,但无一不是着眼于预期收益。^⑦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认为“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导致的冲突缘于损失,^⑧但仍然以损失之前的状态为参考点。换言之,行为体挑起冲突是基于恢复损失之前状态的前景,如果确信冲突会招致更大的损失则不会介入冲突。

① John Mearsheim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68; Andrew Mack, pp.107.

② Ivan Arregui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3-4, 20, note, 25. Andrew Mack, pp.175-200; Ivan Arregui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③ 杨少华:《当代不对称冲突研究——一项以战略为视角的考察(1945—200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24页。

④ 参见 T. V. Paul, pp. 20, 33-35 和 Ivan Arreguin-Toft, pp. xi, 2-3, 6。

⑤ 毛维准、刘奉祯:“透视‘鼠象之争’:‘不对称冲突’理论探析”,上引期刊,第142页。

⑥ 参见 T. V. Paul, pp. 12-13.

⑦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著,何曜等译:《战争的原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⑧ Jack Levy, “Prospect Theory, 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XLI (no. 1, 1997), p. 87; Jeffrey W. Taliaferro, *Balancing Risk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70-171. 转引自林民旺:“国际关系的前景理论”,载《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4期,第107—112页。

为了弥补“预期收益→挑起冲突”因果链的不足，本文提出一个“损失驱动的冲突解释模式”。该模式接受了理性主义的三个基本观点：（1）行为体都是有利益和诉求的，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和正常发展，这些利益（特别是其中的核心利益）必须得到实现。（2）国家和其他组织都是单一行为体，它们的利益是先验给定的，因而不讨论它们内部的利益形成过程。（3）这些行为体根据自己界定的利益采取行动，但它们的利益能否实现及采取何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国际体系结构的约束。

围绕这一解释模式，本文提出的基本观点是：行为体采取行动主要受利益的驱使，但当它们缺乏利益实现手段而成为净受损者时，会奋起与强者乃至国际体系进行抗争，尽管这种行动没有任何直接收益，甚至有可能招致更大的损失。当今国际体系发生了一系列结构性变化，造就了一个集团霸权主义和由弱小行为体组成的国际弱势群体。国际弱势群体既难以获取收益也无法减少损失，只能以卵击石地与强者对抗，以此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诉求。这种非对称冲突是国际体系一系列结构性变化的结果，下面首先考察结构的变化机制及其与体系稳定与和谐的关系。

二、结构及其变化与体系的核心问题

国际体系是国际关系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而结构作为国际体系的核心变量，是从整体上考察国际体系发展演变的关键。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到（广义的）批判理论三大流派对世界政治的基本判断，实际上取决于对结构主义的认同程度。^①

（一）国际体系结构及其变化机制

国际体系结构理论首先是新现实主义的贡献。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认为，体系由结构和互动的单元构成。结构根据体系中单元的排列原则、不同单元所具有的功能和单元间的能力分配来定义。在国际政治领域，由于体系的排列原则（国际无政府状态）和主要单元的特性（独立主权国家）为常数，国际体系结构仅由单元间的能力分配来定义，

^① 刘武通：“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结构主义方法论质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第45页。

并随着单元间能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①

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对沃尔兹的结构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吸收。罗伯特·基欧汉 (Robert Keohane) 和约瑟夫·奈 (Joseph Nye) 关注与结构同等重要的进程因素, 从而建构了“一种同时包含进程与结构的体系层次理论”。^② 亚历山大·温特 (Alexander Wendt) 将观念因素植入结构中, 认为物质结构是客观存在的, 但要通过观念结构发挥作用。^③ 他复活了被沃尔兹设为常量的无政府状态, 并以无政府状态的不同类型界定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

现有结构理论的重心在于如何界定国际体系的结构, 对于结构是如何变化的始终语焉不详。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结构建构主义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结构变化的问题, 但都集中关注体系成员之间物质实力和观念结构的变化, 而忽视了结构变化与体系外行为体的关系。在有关体系外国家与体系关系的有限论述上, 学者和政治家又一味地盯住体系外大国的崛起对国际体系的颠覆效应, 或者专注于某些革命性力量对国际 (世界) 体系的抵制, 而忽视了体系外行为体融入国际体系引起的体系结构变化, 以及这种变化对仍滞留在体系外的行为体的影响。

本文认为, 更具解释力的国际体系结构理论需要汲取各流派的精华, 把结构变化放在体系的进程中去考察。事实上, 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包括质变和量变两种形式, 实力、制度和观念三个维度, 变化的动力来自体系内成员的分化组合和体系外行为体的冲击两个方面。国际体系结构的剧烈变化很少发生, 对于国际生活真正有意义的是结构的经常性渐变, 剧变正是由持续性渐变累积成的。如果从渐变的角度进行考察, 单元特性和排列原则与能力分配一样, 都一直经历着经常性变化并引起结构的相应改变, 而且三者之间的变化也会相互影响, 共同推动国际体系的结构发生变化。结构变化对于体系内成员和体系外行为体都会产生影响。在某些情况下, 结构变化对于体系外行为体的影响更大。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79), pp.76-101, 114.

② [美]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 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22—23、339—343页。

③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 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179—198页。

(二) 结构变化与体系的稳定和和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国际体系结构既是一种实力分配, 也是一种制度形态和行为体持有的观念。结构的形态和变化对于国际体系有重要影响, 具体地表现在体系的稳定性与和谐程度上。稳定性与和谐程度是衡量体系生命力的两个重要维度, 也是国际体系中的两大核心问题。一个不稳定的体系必然是不和谐的; 当稳定不再是问题时, 和谐与否将成为体系中的焦点。

结构的形成和演变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体系内成员对该结构的认同程度, 二是国际体系与体系外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当体系内的多数和主要成员都认同现有制度和规范时, 国际体系结构将朝着稳定和巩固的方向发展, 反之则将不断遭受侵蚀和削弱; 当体系内成员拥有对体系外行为体的压倒优势时, 国际体系中的制度和规范将不断强化并对后者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反之则将遭到后者的集体挑战和打击。

当这两种逻辑趋于重合时, 就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 当体系内的多数成员撤销对现有制度和规范结构的认同, 体系外行为体也继续对其进行颠覆时, 体系结构类似于“倒丁字形”或“金字塔形”, 稳定性是国际体系的核心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就是这样。第二, 如果体系内多数成员一如既往地支持现有制度和规范, 体系外行为体又大量融入其中,^① 国际体系将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稳定性, 体系的核心问题由稳定转化为和谐。这样的体系结构类似于“菱形”或“纺锤形”, 当今国际体系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发展趋势。

因此, 结构类型决定着体系中的核心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 如果体系外行为体向体系内的融入持续进行, 体系结构的反对力量将被压缩到最低限度, 结构对反对声音的压制功能也呈现无限增强的趋势。仅从稳定性的角度看, 现有体系可以高枕无忧。然而, 由于反对力量处于高压和失语状态, 它们可能会不惜代价地向体系主导者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诉求, 并对体系的和谐构成重大隐患。

① 本文认为融入体系的标志性特征是接受并合作性地参与体系内的制度和规范, 也就是说不存在反体系的体系内国家。参见 Jeffrey W. Legro, *Rethinking the World: Great Power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9。

（三）挤车博弈及其体系性后果

在“挤车困境与博弈过程中的身份转移问题”一文中，笔者提出可以将体系外行为体融入主导国际体系视为一个挤车博弈过程。挤车博弈作为体系外行为体与国际体系之间关系的分析模型，不仅涵盖了体系内成员的分化组合及其与体系外行为体的关系，而且能够有效地考察这种关系对体系稳定性与和谐程度的影响。^①从主导国际体系的角度看，体系外行为体融入的过程也是体系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体系内成员的增加会相应地改变单元间的实力分配状况，更从根本上改变着国际体系与体系外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和力量对比，这既强化了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制度和规范，又削弱了体系外行为体的整体实力及其与国际体系讨价还价的能力。体系外行为体的融入与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呈正相关关系，随着这一进程的延伸，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将持续增加；而随着稳定性的增加，和谐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凸显。

自民族国家形成以来，世界主导国际体系从西欧向世界各地不断扩展，最终形成了一个由空前广大的主导体系与部分体系外行为体组成的全球性体系。15世纪末的时候，世界上有五个彼此独立的地区性国际体系，分别是以西欧为中心的欧洲国际体系、亚非欧交界处的奥斯曼帝国体系、以中国明王朝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以及黑非洲部落群和美洲印第安人社会。无论从实力、制度还是规范角度看，西欧国际体系都不拥有对奥斯曼帝国和东亚朝贡体系的优势，各体系和文明都按照各自的节奏独立地向前演进。然而，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殖民扩张，西欧国家相继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并完成了工业革命，从而大大增强了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从此，以西欧为基地的西方国家获得了对其他国际体系的绝对优势，并于19世纪末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了全世界。

欧洲殖民体系是一个虚假的国际体系，它不仅面临着列强之间瓜分赃物的内部斗争，而且遭到了非西欧国家和民族的激烈抗拒。二战后这一体系土崩瓦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退回西欧和北美，成为与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并立的地区性体系。如果把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视为世界主导国际

^① 参见赵广成：“挤车困境与博弈过程中的身份转移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2期，第39—42页。

体系，其他国家竞相加入就是本文所说的挤车博弈过程。沙皇彼得大帝于17世纪末发动了西方化改革，标志着体系外国家挤车博弈过程的开始。19世纪60年代日本进行“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成为体系外国家融入西方体系的第一次成功实践。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世界主导体系只涵盖数量有限的西方国家。在体系外行为体大量存在的情况下，挤车博弈有利于体系外国家。但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发生了多方面的结构性变化，从而大大削弱了体系外行为体与国际体系讨价还价的能力。

三、当今国际体系的三大结构性变化

相对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来说，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属于体系外行为体，但后二者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某种融入前者的趋势。早在20世纪40和50年代，就有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发起变革运动，并扩大了与西方国际体系的交往。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之时，大都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式发展道路，有的还与西方国家保持着战略同盟关系。

20世纪60年代以来，体系外国家掀起了两次挤车博弈高潮。第一次是60和70年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产油国的崛起。它们在崛起的同时逐步成为西方体系内的成员，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日趋淡化。第二次是7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中国早在70年代初就与西方国家改善了关系，70年代末又开始了改革开放。80年代末，伴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融入西方体系成为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目标。在此过程中，一批体系外国家的实力快速增长，对外政策取向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体系外国家的大量涌入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形成了重大冲击，使之在三个方面发生了明显的结构性变化。

（一）国际体系的集权化

国际体系结构首先是单元之间的能力分配。对于国际体系的稳定来说，两个方面的实力分配至关重要：一是体系内单元间的实力分配，二是国际体系与体系外国家间的力量对比。30年来，世界正经历着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权力大转移，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都在快速增长，一批发展中大国

迅速崛起。^①这一持续增长过程造成了世界范围的权力集中化趋势。

国际体系的集权化首先表现为大国力量不平衡的加剧,即唯一超级大国与其他大国实力差距的拉大。主要国家间的权力分布对国际体系的稳定性有重要影响,而体系中两个最强的国家间的权力比是关键。^②在当今世界美、日、德、法、英、俄、中七个主要国家中,美国的综合国力遥遥领先,在陆地、海洋、空中和太空等各个层面都居于主宰地位。2007年,美国的军费开支相当于全球的50%,比位居其后的14个国家的总和还要多,^③GDP占世界总额的25.4%,位居第二的日本仅相当于其31.69%。^④在此情况下,“一超多强”中的“多强”,无论就单个力量,还是每个力量的组合来说,都不足以牵制“一超”主导和领导世界的意志。^⑤

国际体系的集权化也表现为体系内集团霸权主义的形成,世界上首次出现了体系内主要国家团结在霸权国周围的局面。实力差距过大使各大国不仅没有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能力,基本上也没有对抗所必不可少的意志。不论各国对美国如何批评,由于在不同领域和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对美国的依赖,更多地还是顺应等级体系改善与它的关系,而不是横向联合共同制约美国。^⑥这样一来,美国得以将世界主要国家纠集或吸引在自己周围,形成了在体系中占压倒优势的集团霸权主义。^⑦以前的霸权国无一例外地都把自己置于世界的对立面,美国则成功地把世界主要和多数国家变成自己的盟友或战略伙伴。

国际体系的集权化还表现为第三世界的大国和富国纷纷加入国际体系,导致世界权力迅速向国际体系内集中。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批发展中国

① [美]法里德·扎卡利亚著,赵广成、林民旺译:《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IX—X页。

②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9—480页。

③ [美]法里德·扎卡利亚著,赵广成、林民旺译:《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第177—178页。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2007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为5467.86亿美元,是第二军事大国俄罗斯(353.69亿美元)的15.5倍。参见<http://milexdata.sipri.org/result.php4>。

④ 参见世界银行Key Development Data & Statistics数据库,载<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DATASTATISTICS/0,,contentMDK:20535285~pagePK:64133150~piPK:64133175~theSitePK:239419,00.html>。

⑤ 宋玉华等:《新兴大国——历史性崛起的博弈与前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

⑥ 牛军:“冲击带来变化”,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3期,第17页。

⑦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页。

家实现了经济大发展和国力大提升,有的早已达到、甚至超过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三世界的发展、力量的增强和地位的提高,实际上主要指的是这些国家。2008年,世界146个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GDP近20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33.13%,其中50个发展中大国占93.48%,而“金砖四国”、墨西哥和“四小龙”就占56.54%。^①新的实力和地位使这些国家与一般发展中国家渐行渐远,也越来越认同体系内的制度和规范。它们积极融入体系不仅使世界权力迅速向国际体系内集中,而且还造成了另外两个体系性后果:国际体系的制度化和合法化。

(二) 国际体系的制度化

国际体系强调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和力量分布,国际社会则侧重于在行为体互动增强的基础上,带有强制性的价值观和制度、规范的形成。国际社会的形成和强化必然导致国际体系的制度化,但当今国际社会基本上是不对称的力量扩展和利益追求的结果,其主导价值观、制度和规范的内在局限性产生了一系列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后果。

国际体系的制度化首先表现为国际制度的强化,即国际制度遍及各领域并具有越来越强的约束力。二战后西方国家主导建立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并以此为支柱确立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国际制度。这些地区性国际组织最初并不具有广泛代表性,但在西方国家强势权力的支撑下不断扩大,如今已经成为各有关领域的主要或主导性制度安排。国际制度的强化对于强国和弱国的影响截然相反。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既能依仗实力追求霸权,又可利用国际制度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同时对其他国家进行约束;小国和弱国不但难以据此享受到国际社会的庇护,反而被大国主导的体系规则剥夺了挑战 and 改变体系现状的权利。

国际体系的制度化也表现为国际无政府状态的递减,国际制度在很大程度发挥着国际权威的作用。近年来,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假定从理论上受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8年《世界经济展望》涵盖173个国家和地区,将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归入“发达经济体”。本文沿用传统的发展中国家概念,涵盖西方发达国家之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这里所说的发展中大国、强国和富国包括中东欧14国、独联体12国、“四小龙”、东盟5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及其他15个国家(中国、印度、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南非、埃及、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秘鲁)。数据来源<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08/01/weodata/index.aspx>。